

革命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历史作用

□ 吴文珑

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不仅在锦州，当时，华东野战军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不惊扰市民，在蒙蒙细雨中，部队官兵和衣抱枪，悄然无声地睡在路边。这一严守纪律的行为令无数上海市民为之动容。

密切联系群众的纪律保证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概括和展现了群众纪律的主要内容，将革命军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态度问题用具体而简明的语言固定下来，从而为人民军队树立群众观念、赢得群众支持提供了纪律保证。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五军第五纵队进入鄂东南地区的黄沙镇时便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这进一步密切了部队和群众的关系，使队伍不但找到了落脚点，而且很快扎下了根。其间，毛泽东在部队中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分头到群众中间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以此推动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毛泽东同部队一起出发时，总是跟着后卫部队检查战士有没有上好门板，捆好铺草。甚至给房东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会非常认真地询问。正因为如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落实形成了军民一致的新型军民关系。井冈山地区曾流传这样的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在艰苦抗战的过程中，新四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在部队开赴前线抗战的沿途，人民群众对新四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慰劳。解放战争爆发后，依靠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行动，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汇聚了广大的民心 and 民力，在战场上连连获胜。比如，大岳纵队在晋南浮山外围地区歼灭胡宗南军精锐第一旅全部。究其原因，正如被俘中将旅长黄正诚所说：我们进入你们的解放区，就像个聋子、瞎子一样，找不着一个老百姓给我们带路，就是找着了，也不给我们好好带路。到你们解放区一点粮食也找不着，官兵打仗、走路都要饿着肚子。

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战胜困难，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密不可分。红二、红六军团南渡澧水后，国民党千方百计地构筑封锁线，前堵后追，不断空袭。部队则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任何愿意抗日的人都表示欢迎，因此，尽管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妥善处理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顺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讲，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做过一些工作，如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这样就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可见，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虽是复杂的，但部队纪律严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能够较快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便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也是不无关联的。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遇到了饮食不习惯、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等困难，有的部队甚至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战时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开敌的机会。为解决上述问题，邓小平在光山召开的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纪，从而克服了队伍中存在的怕打硬仗等消极思想情绪，使他们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东北民主联军某纵队以教育和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战斗意志显著增强。在白龙驹山战斗中，该部以一个团兵力歼敌新一军暂五十六师之一团。整体看来，解放战争期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部队的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为红军长征出发赢得宝贵时间的重要一战

——江西石城阻击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 赵 旭 许亚萍 马晓敏

石城阻击战纪念碑坐落在江西省赣州市石城阻击战纪念馆内，碑高19.34米，代表战斗发生在1934年。碑身由三根顶面倾斜的柱体重叠而成，象征参加阻击战的三支部队，即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以及闽赣军区独立第七团、第十一团。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时任红三军团红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谢振华题写的“石城阻击战纪念碑”8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字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顶为不锈钢喷绘红旗和手握冲锋枪结合而成的雕塑，寓意石城阻击战最后的胜利是红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取得的。基座刻有碑文：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九三四年四月底，广昌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兵分六路，向中央根据地腹地步步逼进。八月卅日，占领了地处广昌、石城交界的战略要地驿前。中央苏区危在旦夕。为了迟滞敌军向中央苏区进犯，确保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顺利转移争取更多时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闽赣军区独立七团、十一团计三万将士，止九月底阻敌于石城以北。

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参战红军从广石边界的莲坑、分水坳一线到石城城北的李腊石、西华山一线约五十华里的纵深地域，设置了三道防线。与集结在石城北部的敌军九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一个保安团和驻广昌机场空军的十万敌军对垒激战。

石城阻击战是一场我少敌多的战斗。战斗开始，两军对阵，正面交火，敌我伤亡甚众。面对敌强我弱态势，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绍辉、肖华等果敢决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红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制敌于残喘之地。战斗从九月廿六日至十月七日，历时十二天，终阻敌于石城县城以北。

阻击战胜利结束后，红三军团撤

至观下、屏山陈坊打鼓岭背；“少共国际师”撤至龙岗、横江、洋地休整。“少共国际师”在石城得到二千新战士的补充。随后，遵照中革军委电令，十月十日，“少共国际师”从驻地龙岗、横江、洋地出发经长汀、瑞金开往于都。十月十二日，红三军团从驻地观下、屏山陈坊打鼓岭背出发经宁都固厚、长胜开往于都的银坑、车头地域。两支红军队伍踏上了长征之路。阻击战期间，只有十三万人口的石城，就输送红军九千二百零六人，认借稻谷六千五百担，募捐银元六千九百元，数万群众赴战场抬担架、救伤员、运弹药、送给养……这组血汗铸就的数字永远见证着石城人民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大贡献！

石城阻击战，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进行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这次战斗从准备到中央红军主力完全撤离石城，不仅给进犯之国民党军以大量杀伤，而且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推进的步伐，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石城阻击战凝聚的忠于革命，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发愤图强，开创未来！

中共石城县委 石城县人民政府
二〇一〇年五月卅日立

碑文记述了石城阻击战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红军将士坚定的革命信念、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中央苏区北部的最后一道屏障

石城位于赣闽边际、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东北部，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3年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错误的领导下，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 and 堡垒之间，陷于被动。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造成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8月30日，与

石城毗邻的苏区北部重要门户广昌驿前陷入敌手。至此，红都瑞金的北部只剩下石城这最后一道屏障。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三军团应阻石城以北敌人以保卫瑞金布置的指示》，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闽赣军区独立第七团和第十一团以及石城地方部队共计3万余人，在石城与广昌边境地区至石城县城之间设置了三道防线欲奋勇阻敌，竭尽全力协助红军主力转移。

运动防御战术的有效运用

1934年9月26日拂晓，石城阻击战正式打响。国民党军第十、第三、第五等纵队向红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彭德怀、杨尚昆指挥部队利用三道防御工事，轻重火力并举，节节阻敌南进。在第一道防线阻击敌人的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率部同敌人进行了一场肉搏战，经数次反冲锋，终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被迫放弃阵地。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红三军团及时改变战略战术，强调保存有生力量，在一线阵地的各支点只留下少量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则部署在二线阵地，一方面加强对一线阵地的支持，另一方面对深入之敌集中歼灭。直至10月6日，三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才推进到石城县城附近。10月7日，红三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电令撤至石城南部的观下、屏山、横江等地休整、补充、训练。至此，红军成功完成阻击任务。

石城阻击战以少敌多、艰苦惨烈，连续战斗的伤亡使1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锐减到5000余人。红军在敌强我弱的险恶局势下，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且战且退、浴血抵抗，为中央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们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坚实基础

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军纪优良、行止有节，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是分不开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高度重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桂东回师井冈山途中，得知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群众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群众看到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1929年2月，红军在大柏地围歼了国民党军两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但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已上山，因此吃饭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既解决吃饭问题，又不损害群众利益，毛泽东、朱德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食，同时留下借条，张贴布告，说明日后偿还。当红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如数向农民偿还了现洋。群众从这一行动中认识并接受了这支部队，纷纷表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解放战争期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是人民军队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汇报了所属部队纪律情况，其中提到，部队在兴城解决战斗后看到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锦州苹果”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



机关和主力红军集结转移赢得了宝贵的7天时间，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迅速从北路长驱直入中央机关所在地、提前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狂妄计划。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苏区军民始终积极乐观、克服重重困难，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踊跃支前扩红，努力发展生产，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中央苏区时期，总人口仅13万余人的石城县，先后有19327人参加红军，少共国际师在石城休整时补充的新战士就达2000名，为革命牺牲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4225人，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 王冰月

被李先念喻为新四军“猛张飞”的张文津

装暴动。不料事情败露，张文津作为“招纳共产分子”“图谋暴动”的主犯再次被通缉。民众的苦难、个人的挫折让张文津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迷茫。彼时，共产党组织已在各地陆续恢复，各地武装暴动和游击队伍在中华大地如燎原之势给张文津带去了希望，于是他认定要跟共产党走。1937年，张文津在友人的资助下来到武汉，后经党组织介绍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活。

投身革命事业的“猛将”。1938年前后，张文津被安排到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值日军侵犯武汉，形势危急，张文津结束了短暂的学习来到鄂中，担任了鄂中特委直接领导的应城抗敌自卫总队参谋长并兼任第四支队支队长。张文津率部转战敌后，不断给予日伪军打击。当时，根据地附近的大洪山一带土匪很多，他们打家劫舍、绑票抓人。张文津严格贯彻统战要求，单刀赴会同土匪会面，耐心讲解党的政策，令盘踞在山里的土匪们钦佩不已，自觉加入党领导下的军队。

1939年夏，李先念等人率部来到鄂中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第四支队和原新四军挺进团一部编为一团，张文津任团长。此后，张文津率部参加了大大小小10多次的战斗，打起仗来，他总是身先士卒。鄂豫边区根据地附近有日军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张文津分析情况后，毅然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率部冲锋，在憨山寺周边击毙日军10余名，打伤大批敌人。之后，他又指挥部队在新街重创偷袭的日军，取得了新四军在

鄂中一场空前的抗击日军的胜利，极大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

1940年春，党组织安排张文津到延安学习深造。张文津到延安马列学院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的生活让他的思想面貌和军事技能焕然一新。不久，中央决定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张文津遂结束学习被任命为第五师十五旅参谋长。其间，张文津参与指挥了十五旅在当阳香炉山的反顽战斗和荆南四明山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作战中，张文津英勇机智，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一次因天黑，张文津率部转移辨错了方向，走到敌人据点附近还不知道。当敌哨兵喝问口令时，张文津随机应变说自己是来查哨的。敌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成为我军的俘虏，并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据点，抓获了50多名伪军。后来，李先念在会上表扬张文津说：“我们的‘猛张飞’还粗中有细哩。”

“冲要勇猛如虎，守要稳如泰山。”张文津不仅作战勇猛，而且特别注重军队的军风军纪建设。他常说：“军队就要像军队的样子，冲要勇猛如虎，守要稳如泰山。”敌后生活非常艰苦，他总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战士，以严肃纪律整顿军队作风。张文津所在的十五旅很大一部分是起义人员，部队人员思想复杂、组织纪律性差。张文津便经常深入连队，与战士们谈心交流。平时，他要求指战员做到仪容整洁，个人卫生干净，看见战士们衣服破了就要求及时缝好。随

着部队向湘鄂西地区挺进，规模不断扩大，他愈发强调军队的思想教育。他把在马列学院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革命实践，担任抗大十分校第三支队支队长时，亲自编讲义、上军事课，短短两年时间就培训了500多名干部。

张文津对待战士始终做到一视同仁，坚持发挥表率作用，从不搞特殊化。有时偶遇生病战士，他就吩咐警卫员用自己的津贴去买面条、鸡蛋送过去。一次，警卫员为照顾他，把省下来的鸡蛋埋在碗里，张文津发现后立马问：“大家都有吗？”见警卫员红着脸，他严肃地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享福发财的。”

1946年，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军的阴谋破产以后，使出“假和谈”的惯用伎俩。为揭露国民党“真内战”的野心，党组织决定派代表张文津等三人前往西安同胡宗南部谈判。途中，却遭到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和非法审讯，并被秘密下令就地处决，张文津被残忍地杀害，年仅39岁。

张文津遇害后，中共中央发出强烈抗议，要求彻查真相，但胡宗南却矢口否认，拒绝调查。1984年前后，张文津等三人的详细遇害经过被调查清楚，公之于众。后来，李先念评价张文津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

